

※宋代經學研究專輯※

## 舉辦「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的意義

林慶彰\*

—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自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奉准成立時，即設有中國古典文學、近現代文學、中國哲學、比較哲學和經學等五個研究方向。由於近數十年來經學的研究逐漸凋零，中國文哲所經學組也成為經學研究的唯一根據地。本所經學組研究人員所承受的學術壓力也相當沉重。

經學的內容無所不包，可研究的方向甚多。如就大的方向來說，可分成兩個大範圍，一是經書本身的研究，此前人已有許多成果。但由於新的材料、新的方法和新的時代背景，自然有新的詮釋。也因此，經書的研究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二是經學史的研究，由於經書是當時學校或家庭教育最基本的教材，所以經書與教育息息相關。讀經是要致用的，經書中的很多觀念也成了歷來政府施政的指導原則，所以經書與政治密不可分。經書有部分是古代社會生活的忠實記錄，逐漸地，這些記錄也成了後人日常生活的規範，所以，經書與各朝代的社會生活關係也非常密切。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特色，學者解釋經書往往帶有很濃厚的時代色彩。將各時代的經書詮釋，經書與教育、政治、社會等的關係貫穿來看，是一綿延不斷的經學發展過程。研究經學在歷代的發展演變，也就是經學史的研究。

經學史的研究，自清末劉師培作《經學教科書》、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發其端，隨後有馬宗霍的《中國經學史》、甘鵬雲的《經學源流考》。在日本，則有本田成之的《支那經學史論》、瀧熊之助的《支那經學史概說》、安井小太郎等的

---

\* 林慶彰，本所研究員。

《經學史》。此後，再沒有較完整的經學史著作出現。經學史的研究所以停滯不前，因素很多，但以古史辨學派視經書為偽史料，打擊經學研究士氣有關。另外，中國大陸廢除經學這一學科，文革時期並視經學為封建餘毒，也加速經學的衰亡。

回顧清末至民國時期所出版的經學史，大抵有下列數方面的缺點：其一，篇幅短小，數種經學史，每種都僅有一兩百頁的篇幅，以如此短小的篇幅，如何深入論述二千餘年經學的演變。其二，內容的偏失，有些著作帶有相當主觀的色彩，如皮錫瑞的《經學歷史》，是從今文學家的觀點來論述，且論明代經學史，大抵都是負面的評價。馬宗霍的《中國經學史》，大抵抄自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未能建立較客觀的觀點。其三，缺乏經學專家之研究，由於篇幅短小，各個時代的經學僅能作概略的敘述，各經學家治經的內涵和特色，根本無法顧及，如有論及，也僅三言兩語。正因為有以上數個缺點，經學史發展的脈絡，也尚未完全釐清。為釐清經學史上的種種問題，本所經學組的同仁，決定先研究經學史。

在各時段的經學史中，明代所受的誤解最深，清代的爭議最大。歷來學者以為明代的經學最為淺陋，根本不足觀，本人作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一書，已糾正了部分學者的誤解。清代經學所以引起爭議，是學者認為祇重視鉅訂的考據，忽視高深的學問，清末的積弱不振，即導因於此。

## 二

由於經學史長久以來受到冷漠忽視，研究成果不彰，我們決定從經學史入手研究。又因為清代經學所受的誤解最多，我們決定先研究清代經學。為了作較周詳的準備，我們先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日舉辦「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，有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日本、美國，和本地的學者一百餘人參加，發表論文十九篇。論文的内容涉及清代經學中的《易》學、《尚書》學、《詩經》學、《三禮》學、《春秋》學、《四書》學，還有日本的考據學等。論文集已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出版。接著，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召開「乾嘉學術研究之回顧」座談會，廣泛聽取各方學者的意見，以作為將來執行「清乾嘉經學研究計劃」的參考。為了解並充分反映乾嘉學術的研究成果，我們請汪嘉玲、游均晶、侯美珍三位學弟編輯《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》，收錄相關研究成果近三千五百條。這一目錄，也成了研究清學的必備工具書。

「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以後，受到不少國內外學者的鼓勵，希望我們往上追溯，繼續舉辦明代、元代、宋代、隋唐五代、魏晉南北朝、漢代、先秦等時段的經學研討會。爲了讓學者能先了解明代經學研究的現況，我們邀請黃琪俐學弟，蒐集研究明代經學的研究成果，編成〈明代經學研究論著目錄〉，發表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五卷二期（民國84年6月）中。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日，我們舉辦「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，有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日本、美國，和國內的學者、研究生近兩百人參加。計發表論文十九篇，專題演講兩篇，合計二十一篇，會議論文集已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出版。

辦完「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以後，有些學者勸我們直接辦宋代經學會議，因爲元代的經學並不足觀。個人以爲元代經學是宋代經學的注疏，宛如南北朝隋唐經學是漢魏晉經學的注疏，且是由宋入明的橋樑。不了解元代經學就不知宋、明經學的傳承和轉折關係。基於這一理由，我們決定舉辦「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。爲了讓學者能先了解元代經學的現況，我們請黃智信學弟先編輯〈元代經學研究論著目錄〉，刊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七卷二期（民國86年6月）中。這次「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，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日舉行，有中國大陸、日本、美國和國內學者、研究生近兩百人參加，計發表論文二十六篇，論文集由本所副研究員楊晉龍先生主編，分上、下兩冊，已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出版。

從清代至元代三個朝代的經學研討會，我們看到參加的學者、研究生越來越多，即使元代這麼不受注意的時代，仍有數十位學者自始至終，全程參與。另一方面，發表論文的學者也逐次增加，清代有十九篇，明代有二十一篇，元代有二十六篇，論文集也由明清時代的一冊變成元代的兩冊。此外，每個時段都有不少論文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，如清代會議中，研究李光地的《易》學、方苞的《春秋》學、宋翔鳳的學術；明代會議中，研究胡廣等的《書傳大全》、《詩傳大全》，黃道周的《儒行集傳》、高攀龍的《春秋孔義》、高拱的經學思想；元代會議中，研究胡一桂、吳澄、董真卿的《易》學，吳澄、王充耘、陳櫟、董鼎的《書》學，劉瑾的《詩》學、吳澄的《禮記》學，黃澤、趙汭的《春秋》學，陳天祥、許謙的《四書》學。這種對各經學家的專門研究，不但拓展各朝代經學研究的領域，也爲各朝代經學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

## 三

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日，我們即將舉行為期三天的「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。這一研討會承續清代、明代、元代會議而來，但我個人覺得宋代經學的爭議雖較小，但並不表示沒有遭到誤解。這次會議也許不能完全澄清學者對宋代經學的誤解，但至少仍有數點不尋常的意義。

我們都知道，經學史的發展有所謂漢學、宋學、清代漢學三大階段。宋學繼漢學而起，但對漢學卻大加批判。鄭樵更以「漢儒傳經而經亡」，完全否定漢儒在經學史上的地位。根據屈翼鵬師的研究，宋儒極力反對、批駁漢儒，對他們的經學研究成果，也作全面性的懷疑。此種懷疑大抵有三類：(1)懷疑先儒所公認的經書作者；(2)懷疑經義的不合理；(3)懷疑經的脫簡、錯簡、訛字等。因為如此，大多數的學者似乎以為宋學和漢學是處於相對立的地位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如朱子的《詩集傳》和《詩序辨說》是反對《詩序》的，但如細加分析，可以發現朱子重訂的各篇詩旨，除淫詩三十篇，刺幽王的詩篇三十四首外，大部分的詩旨仍舊遵循《詩序》的。更有甚者，朱子不但未反對《詩序》的〈二南〉教化觀，更給予系統化的解釋。所以，清初的姚際恒曾譏刺朱子說：「遵《序》莫若《集傳》。」此外，蔡沈的《書集傳》，大部分的訓詁也都抄自《尚書孔傳》。從這些事例，可以窺知宋學和漢學間的繼承關係。但如要扭轉學者對宋學的既成印象，不能僅以朱子、蔡沈等人為例而已，需有較全面性的研究。

宋儒的解經方向，也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。前人每以宋人解經是「離經言道」。所謂離經言道，應有兩層的意思，一是不在經書的經文下注經，而是將經書的問題抽離，講學時盡情的發揮，講述某一問題或概念有多至數千字者，如《朱子文集》中的〈舜典象刑說〉、〈已發未發說〉、〈井田類說〉、〈玉山講義〉等都是。二是講述經書時偏離經書的原意，旨在發揮自己的思想，甚至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。此點，學者每每以朱子為例，論述成果頗多。就第一點來說，以離經的方式來注經，祇不過是注經的一種新方式而已。至於注經有否偏離聖人的本義，也必須審慎檢討才可下定論。關於第二點，每一個解經者注經的目的，都在闡明聖人的原意。但因為時代的因素和個人的學養，會不自覺地偏離本義。後人每每將此種現象視為解經者的武斷，或者認為是解經者要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。這種對宋儒解經的

理解，是對歷代解經傳統了解不足所致，亟應導正。

再就經學家的研究來說，南北宋的經學者值得作專門研究的可能有數十人。但數十年來，大部分的學者僅注意歐陽修、張載、二程、周敦頤、蘇轍、鄭樵、陸象山、呂祖謙、朱熹等人而已，其他多數的經學家並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。就如大家最關注的朱子來說，大部分的學者僅注意其《易》學、《詩》學，朱子的《書》學、《春秋》學、《禮》學都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。他的《四書集注》至今仍為閱讀《四書》必備的參考書，而坊間卻見不到一本全面探討其《四書集注》的著作，這是不是很意外？

#### 四

從以上的分析，可以理解宋代的經學有再深一層研究的必要。要深入研究，平常學者沈潛的工夫是第一要事，如能聚集多人召開研討會，大家將各自的研究成果，提出互相切磋，也不失是一種方法。本所舉辦「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」，希望作為與會學者相互切磋成果的園地，也希望能作為學者溝通交流的橋樑。而最終的目的，更希望能引起大家對宋代經學的重視，並作深度檢討，以還宋代經學的真相。